

【论 文】

苏联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关系*

杨 恕¹ 张玉艳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内称“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在对它的出现、存在及影响的研究中，至今还有许多问题和争议。新疆分裂势力一直大力宣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一场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号召继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革命传统”。显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已成为分裂主义的一面旗帜。面对这种情况，加强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揭露其分裂主义的性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苏联为了实现自己在新疆的利益制造出来的，它的组建、发展、变化自始至终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虽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后期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中國革命形势的发展促使苏联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必须指出，苏联-新疆关系是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一个特殊领域，研究苏联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的作用问题时，必须放在中苏关系的大背景之下考察。本文基于苏联解密档案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概略介绍苏联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的作用。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的中苏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中最为复杂，表现出多主体、多层次的特点。这一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是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关系。1924 年 5 月，苏联与北洋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关系后被南京国民政府继承；第二个层次是苏联政府对中國地方政权的关系，这种关系突出表现在东北和新疆；第三个层次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三个层次之间相对独立，又有许多联系。在讨论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的新疆问题、特别是在考察 40 年代苏联在新疆的活动时，一定要考虑苏联对华政策的这三个层次。整体而言，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对中国政策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内容，但是更核心的是苏联的国家利益。这既是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基本背景，也是苏联制定和实施新疆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出现主要与盛世才时期的苏新关系有关，所以本文的叙述从盛世才主政新疆开始。

一、

盛世才执掌新疆时期，苏联与新疆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33 年“4.12”政变后，盛世才实际上掌握了新疆的军政大权。面对经济落后的新疆和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他很快就选择了投靠苏联来巩固自身的地位。当时，支持新疆的亲苏政权成为苏联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内容。为了巩固新疆的亲苏政权，也考虑到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苏联先后在 1933 年 11 月和 1937 年 6 月两次出兵帮助盛世才消灭了马仲英、麻木提等反对武装。苏联的帮助对盛世才进一步巩固新疆的军政大权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此盛世才十分清楚。在苏联提供支持和帮助期间，盛世才或主

* 原文刊发于《边疆与周边问题研究》2016 年第 4 期。

¹ 作者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动、或应苏联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密切与苏联的关系。如 1933 年 12 月盛世才与苏联成立了苏新贸易公司，1936 年提出了“反帝、亲苏、平民，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之后又在 1938 年 8 月访问苏联时主动加入联共，并拿到了编号 1859118 的党员证。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进一步获得苏联的信任和支持，盛世才还出卖了不少国家（新疆）的利益。如 1940 年 11 月，盛世才背着南京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秘密签订了《租借新疆锡矿协议》。虽然协议名称里只有“锡矿”，但实际上是新疆的所有矿产。通过这个协议，盛世才把新疆地质矿产勘探和开采的权力全部交给了苏联，这是一种很明显地出卖主权的行。当时，苏联在新疆境内的地质勘探工作主要在与苏联接壤的北疆阿勒泰、塔城和伊犁三个专区进行，发现并开采了多种重要的金属矿产，如锡、铀、钽、钨、铍等。

卫国战争开始以后，盛世才在莫斯科战役之前对卫国战争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认为苏联要垮了，遂改变政策投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自 1942 年 4 月至 1943 年秋，盛世才先是在政治上开始冷淡苏联，然后采取了一系列恶化苏新关系的行动，公开对抗、排斥苏联，最终以牺牲新疆与苏联的关系为代价，改善了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同时清除了中共在新疆的组织，使中共遭受重大损失。盛世才的反苏行动迫使苏联在新疆的各类专家、地质队、企业及工作人员，包括“红八团”在内的军队，全部撤回国内，致使苏联在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利益都遭受重大损失，全面恶化了苏新关系。与此同时，新疆的社会经济陷入了濒临崩溃的状态，形势急剧恶化，而国民党新疆当局又无力解决各种危机，遂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这恰好为苏联干预新疆局势提供了条件。在此情况下，苏联决定全面干预新疆以恢复自己的影响和利益。

苏联干预新疆的目标首先是恢复苏联在新疆的势力。盛世才改变亲苏政策之前，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关于这一点，斯大林的德文翻译瓦连京·别列日科夫（Валентин Бережков）曾回忆说，“起初我很惊奇：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文件中，新疆被划分为一个特殊地区并由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坎诺佐夫（В. Г. Деканозов，此人是格鲁吉亚人，与 Л. 贝利亚关系密切。曾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总局副局长，是大清洗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 Л. 贝利亚被处决后不久，也被执行死刑）负责。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中国的这个省实际上是由莫斯科在管理。”盛世才投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并采取排苏政策后，苏联很快丧失了在新疆的大部分利益，这是斯大林不能容忍的。同时，令苏联政府不安的还有，美国开始积极关注新疆事务，于 1943 年 4 月在乌鲁木齐开设了领事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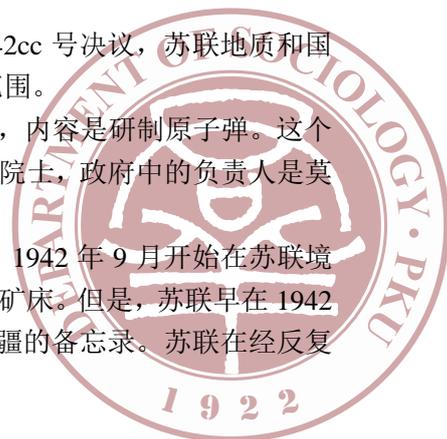
苏联对新疆局势进行干预的另一个重要考虑是保证苏联开采新疆的铀矿。1941 年 10 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Л. 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西方铀计划的情况。了解到美国和英国在积极进行制造原子弹的工作（分别是“曼哈顿”计划和“管道合金”计划）后，斯大林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开始原子弹的研制。主要工作有：

1. 1942 年 9 月 28 日，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组织铀工作》的 2352cc 号决议，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在苏联境内寻找铀矿，而且迅速开始研究从铀矿中提取铀的技术。

2. 1942 年 11 月 27 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开采铀》的 2542cc 号决议，苏联地质和国家安全部门把放射性和战略性矿藏资源丰富的中国新疆纳入了工作范围。

3. 1943 年 2 月 11 日，斯大林批准了国防委员会的 2872cc 号决议，内容是研制原子弹。这个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是苏联著名的核科学家库尔恰托夫（И. Курчатова）院士，政府中的负责人是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

原子弹研制项目开始后，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苏联地质队自 1942 年 9 月开始在苏联境内寻找铀矿的工作成绩不大，而在新疆境内的塔城地区勘探到一个铀矿床。但是，苏联早在 1942 年 10 月就接到了盛世才要求苏联一切人员（外交官员除外）撤离新疆的备忘录。苏联在经反复



交涉无效的情况下，自 1943 年 5 月起，苏联地质专家、地质队及家属开始陆续返回苏联。塔城铀矿对于苏联的原子弹计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关于塔城铀矿的确切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证实。为此，斯大林在 1943 年春没有通过国防委员会、地质、外交等政府机构，直接派著名的纳乌姆·艾廷贡（Наум Эйтингон，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人员，曾成功策划了暗杀托洛茨基的计划，深得斯大林信任。担任过内务部《С》处、即核武器处副处长等职务）去新疆了解铀矿的具体情况。艾廷贡在新疆待了几个月之后，撰写了一份报告直接交给了斯大林本人。报告的结论是：新疆塔城塔尔巴哈台山的支脉中的铀矿是确切的，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艾廷贡的报告加快了苏联干预新疆的步伐（铀矿正式开采后，整个矿区由苏联红军负责保卫，而民族军只能在 6-7 公里之外担任外围警戒，不得进入矿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也无权过问矿区的任何情况）。

在上述目标的驱动下，苏联在从新疆撤出人员和机构、军队的同时，做出了全面干预新疆局势的决定。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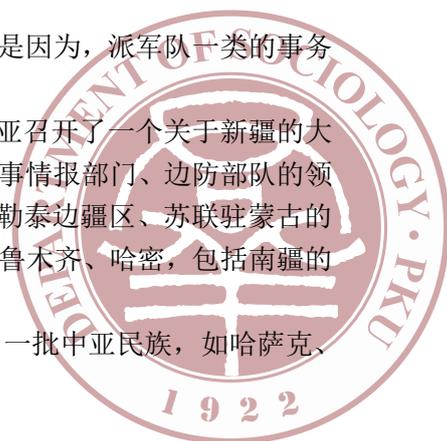
在苏新关系恶化过程中，苏联曾做出一些努力，希望使关系有所缓和、恢复，但没有结果，于是，在撤出人员的同时，开始了进行干预新疆的准备。这一时期苏联干预新疆的过程大致从 1943 年 5 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主要内容如下：

1.1943 年 5 月 4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全面干预新疆，并做出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疆的决定》。会议指出，“盛世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尽管苏维埃国家帮助了他多年，但他不仅没有珍视这点，反而采取步骤给苏联带来严重损失。因此，认为采取措施把盛世才从该省政权中清除掉是必要的。”“为此，提出建议着手建立‘民族复兴小组’，其成员既有新疆本地居民，也包括拥有苏联国籍且与新疆民族相同民族的人。”同时，“决定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若干所学校，以培训此类小组的领导人 and 宣传干部，而他们需要培训新疆居民。”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亚的三个加盟国很快就建立了多所培训学校，负责培训并向新疆派出起义小组的领导人以及对新疆居民进行工作的宣传干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疆的决定》，是苏联全面改变对新疆政策的起点和纲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联共（布）中央做出干预新疆决定的时候，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战役已开始酝酿，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斯大林在此时考虑新疆，更证明了新疆在苏联对外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为了落实 5 月 4 日决议，成立了一个新疆工作协调组。成员有：А.柯西金（Алексей Косыгин）——代表苏联人民委员会（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总理）；Л.贝利亚——代表内务人民委员会（时任内务人民委员）；Н.什维尔尼克（Николай Шверник）——代表全苏工会（时任全苏工会主席，并主持国防工业内迁及战略物资分配等事务）；М.苏斯洛夫（Михаил Сулов）——代表联共中央（时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但已调莫斯科，随后任联共中央立陶宛局特命全权主席）。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5 月 4 日的决议没有军事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派军队一类的事务是由国防委员会或总参谋部来决定的。

2.为贯彻落实联共（布）中央的决定，1943 年 5 月底，Л.贝利亚召开了一个关于新疆的大型情报工作会议。参加人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军事情报部门、边防部队的领导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勒泰边疆区、苏联驻蒙古的情报部门的领导人，以及在新疆的各个情报站的负责人，如伊宁、乌鲁木齐、哈密，包括南疆的喀什、库车等地。会议的宗旨是为全面干预新疆做好情报工作。

3.1943 年下半年，苏联红军总部从西方前线作战的部队中抽调了一批中亚民族，如哈萨克、



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民族的军官和士兵到新疆。据资料，在 1944 年 11 月 7 日伊宁暴动之中与之后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主力是从哈萨克斯坦潘菲洛夫市派来的苏联正规军，有几个团的兵力，而不是起义不久、人数不多的游击队。

4.1944 年 12 月 5 日，根据 Л.贝利亚的命令，苏联内务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任务处，主要任务之一是负责“领导（黑体系本文作者所标示）新疆的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并向其提供帮助”。此时，苏联军队已经进入新疆。这个特别任务处的处长是弗拉基米尔·叶戈纳洛夫(Владимир Егнaров)少将。根据特别任务处的部署，阿拉木图、安集延、塔什干等地设立了训练基地，对新疆在苏学习和逃苏人员进行军事训练，作为武装斗争的骨干。后来，叶戈纳洛夫少将兼任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总军事顾问一职。

5.1945 年 4 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正式成立，随即决定从北、中、南三个方向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即“三线攻势”），以扩大“共和国”控制区，而此时大批国民党军队已开始进驻新疆。为了加强民族军的作战能力，1945 年 6 月 22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为了巩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即民族军），向新疆派遣 500 名红军军官及 2000 名军士和列兵。这项工作迅速完成，并由内务人民委员 Л.贝利亚向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作了书面报告。当时，民族军的总人数约 2 万人左右，500 名军官和 2000 名军士、列兵大都担任了各级指挥员的职务，从而建立起一套由苏军人员担任主要领导的从师长、团长一直到连长、排长、班长的作战指挥系统。还应指出的是，从伊宁暴动开始，苏联除派出大量军队参与军事行动之外，还提供了大量武器和装备，其中不少是在苏德战场上从德军缴获的。二战期间在新疆出现大批德制和苏制武器，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能是唯一的。苏联的这些援助，从根本上提高了民族军的作战能力。

6.苏联当时的军事、情报、党政文件里面很少使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字，而使用“东突厥斯坦革命政府”、“东突厥斯坦苏维埃政府”等名称。这种称呼，无疑反映了这个政权的特殊背景。

7.由于苏军的再次参与，民族军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很大成果，1946 年 8 月，进军到玛纳斯河西岸，已离乌鲁木齐不远。此时苏联和国民政府已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 月 13 日签订），而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对苏联来说弊大于利，为此苏方命令民族军停止进攻。

8.上述一系列决议和行动基本完成之时，1946 年 8 月 6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Л.贝利亚、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Круглов)、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Абакумов)向联共（布）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由政府奖励内务部-国家安全部行动小组的优秀工作者，（因为）他们胜利地完成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43 年 5 月 4 日确定的在新疆的任务”。这份报告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苏联干预新疆的计划和行动，也说明了 5 月 4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的重要作用。

从档案资料的内容来看，苏联干预新疆的计划和行动是由联共中央的核心—政治局决定、斯大林批准的，主要目标、基本方针、政策、执行部门都确定得非常清楚。在计划中，莫洛托夫总体负责，并协调党政机关的工作，而情报工作由 Л.贝利亚亲自指挥，参与军事行动的有正规军、边防军和内务部队。资料表明，苏军参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事行动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 1944 年 11 月伊宁暴动期间，苏军成建制地越过边界直接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兵种有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和空军。由于苏军参战，国民党伊宁守军被全歼；第二次是在 1945 年 6 月开始的“三线攻势”中，由 500 名军官和 2000 名军士和士兵组成民族军的骨干参加作战，迅速取得了战场优势。很明显，民族军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对国民党军队的胜利，主要是由于苏军的参与，否则胜利是不可能的。

当时苏联和中国是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如果苏联对盟国进行颠覆的活动被揭露出来，对苏联

的形象和利益非常不利，因此，领导和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整个过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档案当年都是绝密级的（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ый）。

1945年1月5号在伊宁召开了一次“东突厥斯坦人民大会”，大会发表了一个国家主权宣言，宣言中明确讲“中国对东突厥斯坦领土的占领已经被根除；已建成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我们要同全世界所有国家、尤其是苏联建立友好关系。”这个宣言明白无误地表示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分裂性质，也说明了它与苏联的特殊关系。正是因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分裂性质，所以现在新疆分裂势力的多个组织都在其纲领等文件中提到这段历史。例如，在哈萨克斯坦成立的“维吾尔斯坦人民党”刚一成立就宣称：要继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前期，在它的管辖地域内，普遍发生了反汉、仇汉乃至残杀汉人的事件，而且不分性别、年龄、身份，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后果。其中，民族军起了主要作用。我们认为，苏联应该对民族仇杀负主要责任。一支实质上由苏联指挥和控制的军队，其重要行动的责任无疑应该由它的指挥者来承担。正是苏联为了掩盖自己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意策划、挑动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仇汉、排汉行动，以此表示“共和国”是由新疆民族矛盾所引起的民族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苏联政策的结果，因而与苏联无关。出于同样目的，苏联安排了有内务部背景的苏籍乌兹别克族人艾力汗·吐烈(Алихан Тюрпе)担任了“共和国总统”。这些事实表明，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精神。

还有资料表明，在苏联武装介入时，俄侨是民族军中人数仅次于维吾尔人的第二大群体。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在新疆的俄侨的情况。帝俄时期，在北疆已有不少俄侨。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军官兵和不少俄罗斯官员、商人等总数达到五万多涌入新疆，使俄罗斯人（俗称白俄）人口大增。苏联在新疆的领事、间谍、商务、内务等机构对这些人做了大量工作，要求他们从事苏联安排的任务，而条件是给他们苏联国籍、工作补贴，以及工作优秀者可以回到苏联等，这对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因此，许多俄罗斯人在新疆为苏联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军中的一些军官就是原白俄军人或官员。实际上，俄侨在民族军中的作用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这也说明了苏联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民族军的影响。

1945年8月13日，《苏中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在此情况下，苏联决定停止“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事行动。先是Л.贝利亚签署了《关于停止苏联红军在新疆的积极活动的命令》，接着苏联充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调解人，促使双方开始了和平谈判，并于1946年6月建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在此情况下，苏联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支持并未完全取消，只是在规模上缩减，而各种联系仍然保持着。档案资料表明，虽然新疆开始了和平谈判，但斯大林对谈判能够取得什么结果是很怀疑的，并做好了随时干预新疆的准备。

1947年6月，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三区代表撤回了伊宁。此时，解放战场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延安。面对这种局势，苏联认为中共快要被打垮了，并开始着手准备应对措施。1947年9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制定了《关于新疆的决定》，这一决定“成为新疆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新浪潮的开始”。

下面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苏联再次干预新疆的具体打算。

1947年6月29日，苏联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沙亚赫迈托夫(Ж. Шаяхметов)向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А. А. Жданов)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在政治组织方面建议：“1. 以分散的民族复兴团体为基础并依靠反汉的那一部分穆斯林居民建立共产党，将其命名为‘新疆人民党’，并采用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可的纲领和章程。2.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负责对这个党进行日常的、非公开的政治领导。3.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



斯坦的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应与新疆人民党中央在确定的专区内一起开展相关工作。……哈共（布）中央委员会应在与哈萨克斯坦领土相接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专区开展工作。4.……应依靠那些已从或正在从各个边境苏维埃共和国派往边界之外的共产党员顾问和教官，合理地建立一个由 15 个人组成的新疆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其成员应来自新疆非常知名的进步的穆斯林权威人士，而且他们应该把自己的命运同最近积极参加反汉武装起义的群众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一原则，应首先在伊犁、塔城、阿山专区，而后在新疆所有专区建立新疆人民党各专区委员会。5. 本建议书的第四点应扩大到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和新疆青年联盟各专区委员会。”

上述第 1 点和第 2 点充分说明，“新疆人民党”实际上是联共（布）的分支机构，而“依靠反汉的那一部分穆斯林群众”来建立这个党，则说明联共（布）打算再次利用民族矛盾干预中国内部事务。无论是“新疆人民党”还是“新疆青年联盟”（类似于苏联的共青团），它们的组织系统将完全由联共（布）中央领导，纲领和章程也由联共（布）中央批准。这两个系统将成为联共（布）的一个分支机构或者附属机构。这种做法与联共（布）在策划“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期间建立“民族解放组织”的做法如出一辙，但强度增加了。联共（布）中央对哈共（布）中央这个报告的态度，目前还缺乏档案资料的证实。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迅速胜利，哈共（布）的建议可能只执行了一小部分，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却远未消失。2002 年 9 月在阿拉木图成立的“维吾尔斯坦人民党”就从名称上继承了“新疆人民党”。此外，哈共（布）中央还向联共（布）中央建议，在阿拉木图州东部，就是现在哈萨克斯坦的热尔肯等几个县，单独再建一个州，以使干预新疆的行动更方便。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报告没有涉及军事行动，其原因很简单——军事指挥权在莫斯科，不是哈共（布）职权范围内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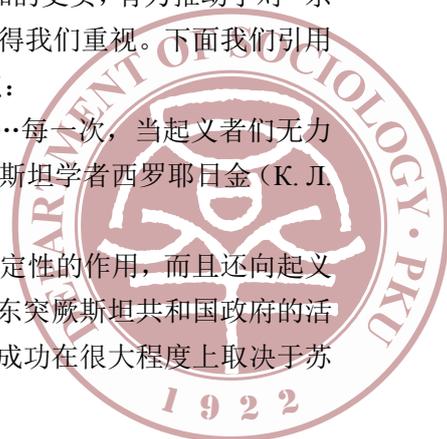
1949 年 6 月，在解放战场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商讨建国事宜和建国后两党、两国的关系、苏联对华的援助等事宜，其中也包括新疆和东北问题。在谈到新疆问题时，斯大林表态称，既然中共将很快掌握政权，联共（布）可以出面做工作，让“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集体接受中共的领导。随后，苏联驻新疆各机构开始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命令，推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中共接触、联系，并逐渐接受中共的领导。事实表明，斯大林、或者说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是促使三区革命融入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原因。

三、

以上简单介绍了苏联支持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过程。对于这些相关内容，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外的研究还相当不足。苏联解体以后，由于原苏联档案部分解密，一些学者对苏联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关系做了不少研究，揭露出许多此前不为人知的史实，有力推动了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些学者的分析及看法，很值得我们重视。下面我们引用几位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学者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性质的观点：

“没有苏联方面的积极支持，‘三区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每一次，当起义者们无力前行时，红军部队都会越过边界前来，干完事情后就撤走。”——哈萨克斯坦学者西罗耶日金（К. Л. Сыроежкин）

“可以完全确定地说，苏联领导层不仅在起义的组织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向起义者提供了物质、军事技术和教练人员的援助，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的活动。”“今天可以肯定地说，1944-1945 年起义运动在新疆北部三区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



联方面提供的积极而全面的援助。”一俄罗斯学者巴尔明（В. А. Бармин）

“1941-1945年新疆的局势是按特定计划发展的，而这些计划又与民族分裂主义密切相关，是要脱离中国。苏联在此种情况下的政策表现出矛盾性。在（1944年）这一阶段中，苏联在自己的计划中利用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最后，莫斯科和重庆之间找到了一种政治妥协。”一俄罗斯学者卢吉亚宁（С. Г. Лузянин）

“毫无疑问的是，苏联领导层在1931-1934年、特别是1944-1949年民族解放运动相关事件中的行为明显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俄罗斯学者波里卡尔波夫（И. А. Поликарпов）

“苏联领导人在组织‘三区革命’中的主导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同样的是，起义运动直接依赖于莫斯科的立场，取决于苏联方面帮助的程度和规模，这些对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主导作用。总之，新疆民众在苏联领导进行的一场与中国的政治大博弈中，只是一张可以用来交换的牌。”一俄罗斯学者克拉西里尼科夫（В. Д.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上述观点尽管有所差异，但都认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三区革命）是苏联主导的，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很值得我们思考。毋庸讳言，多年来，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三区革命）的评价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其中，毛泽东所做的“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新疆牵制了近十万国民党军队”、“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等评价，成为争议中的重要论据。我们认为，毛泽东对三区革命的评价是在三区革命融入中共领导的革命之后说的，有其特殊背景，他当时那样讲是对的。但我们也必须指出，毛泽东还多次说过：苏联要在中国搞两个殖民地，一个是东北，一个是新疆。对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同样应该给予重视。

显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一次自主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是苏联把新疆纳入自己势力范围这一项政策的结果。大量参与其中的各族民众，特别是中下层成员，他们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愿望和要求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他们不可能了解苏联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真实目的和诸多具体行动，不能为分裂、排汉等行为负责，但事实也证明，他们并不是这个所谓的“共和国”的主人。

总之，我们认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苏联为了维护自己在新疆的利益，利用新疆各民族、各阶层民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愿望而制造的一个干预新疆事务的工具，目的是恢复新疆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地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完全由苏联策划、领导、组织，并派出了大量人员参与，他们来自军队、安全部门和党政机构等，这些人员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领导和骨干。为了隐藏干预作为盟国中国的事务的目的，避免国际舆论及盟国的谴责，避免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装扮了穆斯林反汉的所谓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的外衣，并使各项行动高度保密。苏联的这些做法，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毫不顾忌中苏两国的盟友关系，对两国关系造成了恶劣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疆分裂主义的发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前期是苏联主导的分裂政权，后期又在苏联的主导下融入了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过程中，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等人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反对分裂和排汉，积极与中共合作，但他们所起作用有限，而发挥了核心作用的，是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一段历史，不确和疑问之处尚多，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深入研究，以加强反新疆分裂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